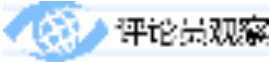


我们能承受什么样的“汽车社会”

我们应该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活方式,不能在追赶欧美生活方式的过程中迷失自我,处处让“消费主义”的理念来引领我们。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9月22日,又逢“世界无车日”。这项活动起源于1998年,发起人是一群浪漫的法国青年,他们在部分城镇限制汽车进入,只允许公共交通、无污染交通工具、自行车和行人进城,让城市在拥堵之中得到片刻喘息。十几年后,全世界上千个城市响应了这个纯真的倡议,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

众多城市。

然而,“无车日”进入中国的这些年,恰恰是中国汽车数量猛增的时段,这些年来,私人汽车大量进入了普通家庭。根据公安部交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8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首次突破1亿辆,超过7500万辆的日本,仅次于保有量约2.4亿的美国,成为全球汽车保有量第二大国。

国人还没有时间来尽情体味汽车生活带来的安逸,便陷入种种难以自持的麻烦

中。马路上成天拥塞不堪,空气中弥漫着尾气的味道,一点点的碰撞和刮擦,都会让双方心惊肉跳。汽车太多了,车轮碾过春末的落花,鸣笛盖住了初夏的蝉鸣。人们无暇触摸季节,每天都被锁死在局促的铁壳里,目睹着道路拥挤、空气污秽的城市,逐渐变得烦闷不安、暴躁易怒。有人形象地称其为“汽车病”。

汽车本身并没有病,生“病”的是我们自己。

据称,中国的汽车保有量,最高可达4.5亿辆。可以想

象,真到了那一天,城市的道路会多么拥挤,油价又会涨到什么程度。汽车制造业本身,能带动50多个相关产业迅速增长,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这些年来,国家对汽车产业大力扶植,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小排量购车补贴、汽车下乡等政策连环出击,中国汽车产业不断扩张。目前中国已经连续两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汽车工业总产值也由2001年的4433亿增至2010年的43357亿元,十倍于当年。

在这样惊人的数字之下,我们似乎忽视了基本的国情——人口众多、资源紧张。中国城市道路的扩建速度,永远赶不上汽车生产的速度。未来,我们能够承受一个什么样的汽车社会?这是一个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应该思考并回答的问题。

其实,所谓“中国的汽车保有量,最高可达4.5亿辆”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作为参照的,而在中国这个主要资源人均拥有

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这样的汽车社会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在“世界无车日”里,让我们暂时告别汽车,在徒步行走中,细细反思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应该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活方式,不能在追赶欧美生活方式的过程中迷失自我,处处让“消费主义”的理念来引领我们。比如,我们是不是应当集中更多的社会资源,下大力气搞好公共交通,减少一点对小汽车的依赖呢?

县长如此神秘当然令人生疑



□本报评论员 韩适南

三年内升迁四次,29岁即任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这一个个亮点让河北馆陶县代县长闫宁成了焦点。

其实29岁当代县长没有什么,也不是公众关心所在。年少居高位,古今中外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公众关心的是,闫宁这一类官员,靠什么得到提拔重用?其任用是否公开公平公正。

然而在记者试图解开这些疑惑时,政府人员却称闫宁的简历是机密,不便公开,而且由于电脑故障已找不到其任职记录。一个党政

官员却成了神秘人物,这种看似搞笑的事情,却不能不让人深思。

公开公平公正,这已是党政官员选拔的基本理念,而馆陶县代县长的简历都无法公开,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在代县长的选拔过程中,公平与公正没有得到保障。不光代县长的简历成了所谓的机密,而且与其有关的政务信息都“消失”了。据《法治周末》报道,以前只要打开馆陶县政府门户网站的“领导之窗”,就可以看到正副县长的个人信息,包括照片、简历和分管工作。但自从闫宁来馆陶工作之后,就只能看到常务副县长及以下政府领导的信息。而近期,就连网站“领导之窗”一

栏也点不开了。

选拔党政官员,目的就是要为公众服务,这不仅是党和政府的事情,更是公众的事情。如果党政官员的身份和经历不公开,就无法取得公众的支持与信任。如果不公开,即便其任命程序合法合规,但在公众心目中,这种干部的合法性就会大打折扣。然而事实是,官员简历不仅没有公开,而且网上的消息也遭到“清洗”。报道称,一位网友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了篇评论闫宁的文章,然而10分钟不到就被删了。

在不公开的现状下,公众对于闫宁的关注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他的身世上。这也是公众最为担心和忧虑

的地方。据《法治周末》报道,自闫宁任代县长以来,各种议论声此起彼伏,爆料层出不穷,传播最多的版本说闫宁出自官员世家,其父曾任永年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供电局局长,闫氏近亲中有两个厅级和三个县级干部。三年内四次升迁,29岁任代县长、简历机密、官员世家,这些词组的相遇给公众的是一种悲凉。如果官员世家之说属实,那我们不得不对这样的升迁抱一种怀疑的态度。

这种质疑,实际上折射出公众的一种焦虑和无奈,正如一些干部所言,大家所做的工作一样,都在努力,都很勤勉,论政绩、资历和能力胜于闫宁的有的是,为

什么有的人常常原地转圈,几年甚至十几年不得升迁呢?这令人难以理解。

“君子坦荡荡”,要让人解开疑惑,必须有公开透明的干部任职程序,必须对媒体和民众做出及时、正面的回应,这也是公共部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的应有之义。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大家自然会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位“青年才俊”,而不是再以异样的眼光去质疑。

所以,闫宁的简历不只是一张纸,公众对于代县长的关注,也不是纯粹的围观。这关系着政府的责任、公众的权利。我们相信,公众需要的不是神秘的官员,而是公开与透明的政府。



殡葬收费公示为啥姗姗来迟

编辑先生:
你好!

看了9月21日《齐鲁晚报》的报道《殡葬收费标准下月起要公示》,笔者从中获悉,从下月开始,老百姓去婚姻登记机关,殡葬服务机构办事,可以清晰了解服务内容 & 收费等服务标准。对咱老百姓来说,这当然算是一件好事,可笔者心中却突然有了一个疑问:是什么让殡葬收费标准公示姗姗来迟?

毫无疑问,其中涉及多种原因,婚姻登记机关、殡葬服务机构手中的“权力大棒”是决定性因素。笔者了解到,现在不少婚姻登记机关、殡葬服务机构并没有张贴服务标准公告牌或者价目收费表,只是以工作人员告知的方式向当事人传达相关信息。只有在当事人强烈要求下,工作人员才会被迫出示。许久以来,都是办事机构一方说了算。如此一来,双方地位不对等,明明白白消费也就只能是空话。

殡葬收费标准公示姗姗来迟,监管不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婚姻登记机关、殡葬服务机构来说,无人监管的现状恐怕持续了很长时间。虽然有上级部门的管辖,但是,社会监督手段和群众监督力度还远远不够。

笔者以为,收费标准被

公示只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一个良好序幕,但要让这些措施有效施行下去,离不开相关部门以及社会群众的管理和监督。否则,即便是现在“风风火火”,只怕日后还是会“无人问津”。

读者 于涛

实现教育公平 刻不容缓

编辑先生:
你好!

9月20日,《齐鲁晚报》报道了济宁一普通初中大量教室闲置的新闻,39间教室只用了12间,而且有的班才20多名学生。

看罢这则新闻,心中感慨良多。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当今社会,许多父母都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孩子送进重点学校,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学校的豪门盛宴,希望自己的孩子鲤鱼跳龙门,跃上更高更强的发展平台。以至于普通学校门庭冷落,重点学校挤破头,还因此产生了诸多教育腐败现象,既让学生家长苦不堪言,也让重点学校校长诚惶诚恐,同时还让孩子过早地被请客送礼等歪风邪气所侵染,侵蚀了孩子幼小的心灵。

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是要实现教育的公平,合理分配教育资源,制定政策鼓励优秀教师向普通学校流动,支持教育资金向偏远校园倾斜,让基础教育的阳光平等地照耀在每个孩子身上,不能让任何一个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才是基础教

育和义务教育的真谛。

读者 程占新

小学生不宜过早“电子化”

编辑先生:
你好!

看了《齐鲁晚报》18日A02版的报道,说的是一位学生家长反映,女儿今年上小学三年级,作文需要写成电子文本,然后通过邮箱发送给老师。可这段时间家里的网络到期了,只好麻烦在济南上班的妹妹把作业发给老师。

我认为,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让学生尽早掌握电脑知识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推行“电子化”作业并不是坏事。但是,在小学三年级甚至更早就完全实行作业“电子化”,就有点极端了。小学生过度地依赖电脑,就会使人脑闲置,这样不利于智力的开发;只用电脑写作业,就失去了动手的机会,恐怕连写字这样起码的能力也掌握不了了;小孩子长时间坐在电脑旁,不仅影响正在发育的身体,还容易诱发难以戒除的网瘾。

读者 孙风强

问题是减谁的税

编辑先生:
你好!

9月21日的《齐鲁晚报》时评版发表了一篇郭松民先生的《笨蛋,问题是谁在纳税》的经济时评。作者认为今年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反而

降低了,不存在过快的问题。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其一,财政收入增速过快是否引起国富民穷的问题。笔者认为,社会财富就像一个大的蛋糕,是由不同的人来分享的,如果有人分得多,当然就会有人分得少。那么,在财政收入增速过快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国家财政分的蛋糕多一些,而民众分的蛋糕就会相对少一些,这不是国富民穷吗?当然,这儿的民众,我们不能够仅仅理解为普通民众,而是包括所有的企业。

其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降低了是否就是增速不过快。近几年来,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速维持在30%左右,而全国GDP的增长速度则在10%左右,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的速度,普通民众的收入增长甚至还没有追上CPI,这难道不是增速过快吗?

其三,作者也承认目前的税负不合理,这一点我完全赞同,但是对于不应该笼统地减税,认为应该穷人降税,富人增税的观点却不敢苟同,这也是为谁减税的问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我国的一项国策,只要富人遵纪守法照章纳税,我看就没有必要再要求富人多交税。我们讲要减税,就应该该流转环节的税收,切切实实地把物价降下来,使老百姓得到最大的实惠。

因此,避免国富民穷,我们需要解决的不是谁在纳税的问题,而是该减谁的税的问题。因为,即使富人纳再多的税也仍然是富人,穷人即使不纳税

也是穷人,但减税了,穷人也可能过上简单舒适的日子。

读者 赵连卿

这一报道不合时宜

编辑先生:
你好!

贵报9月14日封一《围剿地沟油》以及打击地沟油的报道很好,标题很给力,让深受其害的老百姓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当时我认为这次由国务院部署的围剿地沟油行动是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一定会大获全胜,让百姓吃上放心油。

然而,时隔几日,贵报9月17日A05版的《三大症结阻碍根治地沟油》的报道,又一棍子把读者打进了冰窟,让大家从头凉到了脚后跟!什么“无法可依”,什么“无‘标’可测”,什么“有规难行”,这些似是而非的依据,让读者看了很纠结,很失望。

我以为,即便报道的内容都是铁的事实,也不应该在打击地沟油如火如荼的时候,发表如此败兴的言论,况且文中所列并不都是铁的事实,旁边就有《制售地沟油或触犯刑法》“一说”。还有,这无疑等于给地沟油制售者通报了一个重要信息,告诉他们,因为我们的“无法可依、无标可测、有规难行”,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恣意妄为,大胆地接着干,而不会有什么大的闪失。这一报道不合时宜。

读者 示

■本版投稿信箱:
zhangjinling@qlwb.com.cn

>>>个论

不能容忍

“店大欺法”

□张海英

8月24日,沃尔玛冒出严重的假冒绿色猪肉事件。事实上,多个城市的沃尔玛店五年间因屡次违法被处罚了20次,仅今年1月到8月就被罚了8次,而刚被处罚完又出了更大的售假丑闻。

显然,沃尔玛还是那家沃尔玛,在中国频繁违法完全是由于土壤不同。这里所说的“土壤”有多层意思,包括制度土壤、政治土壤、市场土壤等。

制度土壤一是制度本身缺乏威慑力;二是地方执法部门“心太软”。譬如,同样针对串谋涨价行为,我们的罚款标准最高是500万元人民币,而公众经常看到美国当局对价格违法企业的经济处罚高达上亿美元。事实上,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但在现实中,并不见使用这些有威慑力的“武器”。

究其原因,就引出另一个问题——政治土壤。面对商业巨头,显然很多地方政府都会很欢迎,不但可以用来炫耀政绩,还可以用来炫耀当地投资环境,此外还能增加税收。某些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容忍违法,就形成了适合野蛮发展的政治土壤。

同时,目前的商业零售市场即市场土壤也很适合野蛮发展。依靠资金优势、采购优势、优惠政策等支撑,在很多区域市场都形成了垄断局面,一方面压榨供货商,收取高额进场费、通道费,节假日促销费等费用;另一方面,又玩“标签游戏”,销售假冒商品。可以说,既不怕供货商拒绝供货,又不怕消费者“用脚投票”。

遗憾的是,至今没有对这些国际名店进行垄断调查。无论是制造了漏油事故的康菲公司,还是像沃尔玛这样的国际名店,在很多人的眼里都属于“店大欺法”,即由于中国法律法规不完善,处罚标准太低,助长了这些国际巨头的嚣张气焰。但在笔者看来,沃尔玛不仅仅是“店大欺法”,还在欺负中国供货商和消费者,甚至也在欺负某些软弱的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有“店大欺国”之嫌。